

马克思货币异化批判的三次方法论进阶

——从主客体关系异化到资本异化的物性化身

张义修

[摘要]马克思对货币异化的批判经历了多个思想阶段,实现了批判视角的转换和三次方法论进阶:青年马克思从主客体关系的视角出发,确立了异化批判的最初基点,揭示了现代社会中货币对人的统治。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推进,他的视角进阶到了主体际关系的层面,此时的货币异化批判凸显了货币作为社会纽带的中介性,但是仍受制于人本学逻辑。在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之后,马克思对货币异化的批判再次进阶,从经济关系总体高度揭示了货币所反映的社会力量与个人的异化。在资本异化批判的视域中,马克思深入刻画了资本主义经济全过程中货币异化的新现象,形成了关于现代社会货币异化的完整理解。

[关键词]马克思;货币异化;资本异化;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182(2024)04-0029-09

在现代社会理论中,由货币导致的异化现象长期受到哲学、社会学等学科共同关注,而马克思对货币异化作出了深刻精彩的批判,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近年来的相关研究表明,马克思的货币异化批判经历了多个思想阶段,其中包含着观点差异和视角转换。^①笔者认为,纵观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货币异化批判经历了三次方法论进阶。辨析和重新梳理这一过程,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异化批判逻辑的理解,更加完整地解析现代社会中的异化问题。

一、货币异化批判的最初基点:主客体关系的颠倒

马克思经过《莱茵报》时期的新闻实践和巴黎时期的经济学研究,逐步认识到货币在现代社会中的独特地位。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首次指出,货币是市民社会中的上帝,是人的本质的异己存在,^②从而开启了对货币异化的批判。

首先,就哲学方法而言,马克思此时的货币异化批判是对费尔巴哈宗教异化批判的创造性挪用。费尔巴哈提出,宗教关系就是人对自己本质的关系,人将自己的本质对象化为上帝,却没有认识到上帝

作者简介:张义修,辽宁大连人,浙大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

^①张一兵:《金钱权力异化与事物化:资本关系的史前变身——〈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货币章”再研究》,《武汉大学学报》2023年第1期;周阳:《交往异化还是物象化-物化?——论〈穆勒摘要〉中的货币理论》,《现代哲学》2022年第5期;李怀涛:《论马克思对货币拜物教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1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197页。

就是人自己的本质。^①人的本质“从个体的、现实的、肉身的(leiblichen)人的局限中被分离出来(abgesondert),被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t)为一种他者的(anderes)、与其相区别的(unterschiedenes)、独有的(eigenes)本质,受到凝望与敬拜。——上帝的本质的一切规定因而都是人的本质的规定”。^②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直接借用这一分析思路来描述人对货币的崇拜:“正像一个受宗教束缚的人,只有使自己的本质成为异己的幻想的本质,才能把这种本质对象化,同样,在利己的需要的统治下,人只有使自己的产品和自己的活动处于异己本质的支配之下,使其具有异己本质——金钱——的作用,才能实际进行活动,才能实际生产出物品。”^③在这里,货币是人自己的本质对象化、异己化的产物,这是青年马克思从主客体关系出发,对货币异化的基本定位。

其次,从经济学方面来看,青年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人“只有”受到货币这种异己的物的支配,才能在经济世界中“实际进行活动”。这说明货币异化具有现实的必然性。马克思说,犹太教的世俗基础就是现代市民社会的一般基础,即利己性的商业生活,货币成了世俗的上帝。因此,犹太人的解放就是“从做生意和金钱中解放出来”,这也是“现代的自我解放”,“我们在犹太教中看到普遍的现代的反社会的要素”,利己的、追逐金钱的商业活动是“人的自我异化的最高实际表现”。^④这就把犹太人解放的问题归结为现代经济异化问题。不过,马克思此时的批判重心还放在观念层面,他提出“实际需要、利己主义是市民社会的原则……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的神就是金钱”,货币“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⑤

客观地讲,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对货币异化的批判是初步的。这种从人与物、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角度出发的异化批判,只能诉诸人对物的重新支配,却无法告诉我们,重新支配何以可能、如何实现。这也是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批判的问题所在,尽管他强调“将上帝现实化(Verwirklichung)和人化(Vermenschlichung)——就是将神学转换(Verwandlung)、化解(Auflösung)为人本学(Anthropologie)”^⑥,但最终只能诉诸人的感性,其结果是重新陷入唯心主义。同样地,青年马克思提出“犹太人的解放,就其终极意义来说,就是人类从犹太精神中得到解放”,^⑦设想在消除货币异化之后,“犹太精神的主观基础即实际需要将会人化,因为人的个体感性存在和类存在的矛盾将被消除”。^⑧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充满了人本学色彩但是语焉不详的构想。

不过,在马克思不久后写下的经济学摘录笔记和手稿中,他对货币异化的理解已经明显有所深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不仅创造性地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深化了对现代经济异化机制的理解,而且对货币异化问题作出新的阐释。在手稿的第三笔记本中,马克思提出,在私有制社会之中,“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找到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⑨结合上文,这种异己的力量正是货币。“无度和无节制成了货币的真正尺度”,追求货币的无止境的需要,导致经济活动“对共同的人的本质的普遍利用”,这种“病态的欲望”带来的异化表现为,“一方面所发生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致化,另一方面产生着需要的牲

①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荣震华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第39页。

②Ludwig Feuerbach, *Sämtliche Werke*, Bd. 6(Stuttgart-Bad Cannstatt: Frommann-Holzboog, 1960), S. 17.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97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91—192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94页。

⑥Ludwig Feuerbach, *Sämtliche Werke*, Bd. 2(Stuttgart-Bad Cannstatt: Frommann-Holzboog, 1959), S. 245.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92页。这里的“犹太精神”(Judentum)在德文中也有“唯利是图”的意思。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98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9页。

畜般的野蛮化和最彻底的、粗陋的、抽象的简单化”。^①通过这种方式,马克思将货币异化与工人的境遇联系起来。简言之,货币异化带来了劳动异化,劳动异化加深了货币异化。

相较于《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此时的批判不再指向个人的利己主义动机,而是指向货币异化所造成的经济活动的普遍异化。由于人的一切生命活动都日益转变为货币衡量下的经济价值,“作为手段出现的货币”成了“真正的力量和惟一的目的”。^②马克思的新发现是,异化不仅表现为货币对人的统治,而且表现为万物的货币化,“表现为每个事物本身都是不同于它本身的另一个东西,我的活动是另一个东西”,货币就是通过这种衡量一切、交换一切的方式“表现为一种非人的力量统治一切”。^③在此情况下,国民经济学极力鼓吹禁欲、节约,实际上,“它的真正理想是禁欲的却又进行重利盘剥的吝啬鬼和禁欲的却又进行生产的奴隶”,^④即一心逐利的资本家和一心劳动的劳动者,这加深了异化。至此,马克思初步形成了货币异化批判的理论框架。

不难发现,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将批判聚焦于占有货币的资本家和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之间的对立。这种人与人的对立,根源在于物与人的异化,即劳动的产品凝结为货币,颠倒成为一种奴役人的力量。以此为基础,马克思对货币的认识进阶到一个新的高度。

二、人本学主导下的方法论进阶:从主客体关系走向主体际关系的异化

笔者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的后续部分以及同时期完成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以下简称《穆勒摘要》)中,进一步深化了对货币异化的认识,实现了一次方法论进阶:他跃出了主客体关系视角,更加关注物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但在这一阶段,马克思的思路仍然处于人本学逻辑的主导之下,还没有转向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在完成《1844年手稿》的序言之后,围绕货币问题进行了第二次集中论述,从主体与对象的二元关系出发,进展到以对象为中介的人与人的主体际关系。他说,货币由于“具有购买一切东西的特性”,能够“占有一切对象”,^⑤因而成为一种“卓越的(eminenter)对象”^⑥,成为社会中“需要和对象之间、人的生活和生活资料之间的牵线人”。^⑦货币不仅是与人发生关系的物,而且是人与其他人打交道的中介物,“在我和对我来说的他人的存在之间充当中介”^⑧。这是马克思一个重要的新认识。他引述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对货币的精彩描述,认为这段描述反映了货币的“两个特征”:其一,货币“是有形的神明,它使一切人的和自然的特性变成它们的对立物,使事物普遍混淆和颠倒”^⑨,使人的能力变成了货币占有者的能力,这也就是主客体关系维度的异化;其二,货币“是人们和各民族的普遍牵线人”,是把人同“人的生活”、同社会“联结起来的纽带”,因而是“一切纽带的纽带”,^⑩这讲的是货币在主体际关系维度的中介作用。

既然货币反映了人与人的关系,同时“货币的这种神力……包含在人的异化的、外化的和外在化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9—34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4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49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42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59页。

⑥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I/2(Berlin: Dietz, 1982), S. 318.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59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59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62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62—363页。

类本质中”,^①马克思就需要从人与人的关系角度,进一步刻画人的“类本质”。这正是他在《穆勒摘要》中所做的事情。关于《穆勒摘要》与《1844年手稿》的写作顺序,长期存在争论^②,但大多数学者认为,《穆勒摘要》与《1844年手稿》的第二、三笔记本存在密切关联,体现出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笔者认为,《穆勒摘要》中的货币异化批判也可印证这一观点。

首先,马克思用交换活动和社会联系来界定人的“类本质”,以此作为货币异化批判的基础。马克思说,穆勒把货币称为“交换的中介(Vermittler)”,成功地揭示了“事物的本质(Wesen der Sache)”,货币的本质在于“人的(menschliche)、社会的行为”,即人的产品的“中介性的(vermittelnde)活动或运动”,以货币为中介的活动使人的活动“异化了,并成了外在于人(ausser dem Menschen)的物质性的物(materiellen Dings)的特性,成了货币的特性”。^③简言之,货币的中介性质造成人的交换活动的异化。这样,马克思就调整了他关于“人的本质”的界定,从强调生产领域的“自由活动”转为强调主体际关系维度的“交往”“交换”。他说:“人作为一种合群的存在(geselliges Wesen)必然走向交换(Austausch)。”^④基于这种类本质,产生了一种交换关系,即价值,而货币正是价值规定的现实存在。^⑤“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但“只要人不承认自己是人,因而不按照人的样子来组织世界,这种社会联系就以异化的形式出现”。^⑥这就是说,货币是人的社会联系的异化表现。

其次,对于此处“交换”“社会联系”概念的性质,需要加以准确理解。一方面,不宜将其窄化为经济过程中的交换环节。马克思后来表明,新世界观的出发点在于生产而非交换。这样来看,相对于《1844年手稿》关于劳动的异化批判,此处的货币异化批判似乎更外围甚至更不成熟。但马克思后来的经济学研究表明,虽然生产是出发点,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仍是现代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中最显著的特征,也是雇佣关系和异化劳动得以形成的基础。就此而言,笔者倾向于认为,这里的“交换”“社会联系”等概念不是指区别于生产环节的交换环节、交换关系,而是指以交换为基础的总体性的生产方式、社会联系。另一方面,不宜将这里的“社会联系”拔高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因为它还是一个抽象的人本学设定。马克思固然已经认识到,货币异化的基础是人们的社会联系,并且提出“人自身异化了以及这个异化的人的社会是一幅描绘他的现实的社会联系,描绘他的真正的类生活的讽刺画……他个人的造物表现为异己的力量”,^⑦但他还没有对这种社会联系展开具体的、历史的考察,所谓“现实的社会联系”仍是一种抽象的主体际关系,这与《1844年手稿》的理论假设本质上是一致的。^⑧此时的马克思终究还是回到了人本学话语中:“国民经济学把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作为本质的和最初的形式、作为同人的本性相适应的形式确定下来了。”^⑨

最后,尽管马克思未能突破人本学逻辑的束缚,但日益深入的经济学研究已经引导他触及一个新的维度:现代交换关系不仅包含特定的人与物的关系,“还有另一种本质性的关系(wesentliches Verhältnis)”,即人作为一种“总体性的存在(totales Wesen)”,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总是要透过物的交换,与其他人打交道。^⑩这里的“总体性”概念是值得认真对待的。这意味着,在物与物交换的背后,不仅是人与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63页。

②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I/2, Apparatus, S. 696-697;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IV/2, Apparatus (Berlin: Dietz, 1981), S. 717-718.

③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IV/2, S. 447.

④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IV/2, S. 448.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20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4-25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5页。

⑧唐正东:《〈穆勒评注〉中“交往异化”的准确内容及其思想史地位》,《现代哲学》2008年第4期。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5页。

⑩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IV/2, S. 452.

人的交换关系,而且,这种人与人的交换关系,仍旧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当两个人用货币交换商品时,实际上不只是他们两个人在打交道,而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整体商品交换体系在发挥作用,其中包含着经济总体范围内的生产者们和交换者们形成的一种广泛的社会联系。马克思说,这种交换不是偶然的、个别的,而是“社会的、类的行为,社会的联系,社会的交往和人在私有权范围内的联合,因而是外部的、外化的、类的行为”。^①他还提到,货币并不在乎特定的物,也不针对特定的人,“无论与材料的性质、私有财产的特殊性质(spezifische Natur),还是与私有者的个性(Persönlichkeit)都完全毫不相干(Gleichgültigkeit)”。^②这就是说,货币的中介性不是个别的,而是社会的、总体的,因此,货币异化才“表现出异化的物对人的全面统治”。^③

三、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货币异化批判:个人与总体的关系异化

通过前述分析可见,青年马克思的货币异化批判包含三重视角:一是基于主客体关系的视角,批判货币作为人的产物反过来统治人;二是进阶到主体际关系的层面,凸显货币作为社会联系的中介物,反过来成为经济运动的目的;三是初步延伸到现代经济关系总体的层面,但还是用人本学的“类”概念来理解这种总体。其实,现代经济关系总体对人的先在性影响,已经挑战了从人的类本质出发的思路,酝酿着一场从社会关系总体出发的方法论革命。这为货币异化批判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基础。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放弃了从人的类本质出发的哲学思路,并对人本学的异化批判逻辑进行了彻底清算。他改从人的生产实践出发,重新解释现代社会中异化的根源:随着分工的发展,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④可见,马克思没有放弃对异化的批判,但是不再基于人的类本质设定,而是把客观分析个人活动所形成的社会力量作为批判的前提,并寻求在历史发展中予以超越^⑤。具体到货币问题上,马克思指出,在传统社会中“所有者对非所有者的统治可以依靠个人关系”,而在现代社会,“这种统治必须采取物的形式,通过某种第三者,即通过货币”^⑥,大工业“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的关系”。^⑦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后来在伦敦重新研究经济学,并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货币异化问题作了新的、更加系统、更加深刻的论述。

首先,货币源于现实的商品交换活动,是交换价值的物性表现。马克思再次使用他在《穆勒摘要》中分析货币时所用的“社会联系”一词,“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这种社会联系表现在交换价值上……他必须生产一般产品——交换价值,或本身孤立化的,个体化的交换价值,即货币”。^⑧这就是说,个人通过商品交换而联系起来,人的社会联系因而表现为物的交换,而物的交换价值又表现为一种独立的物,即货币,这是商品经济过程中发生的双重“物化”。通过这种分析,马克思深入到经济学家所未达到的层面。“经济学家自己就说,人们信赖的是物(货币),而不是作为人的自身。但为什么人们信赖物呢?显然,仅仅是因为这种物是人们互相间的物化的关系,是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7页。

②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IV/2, S.456.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9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38页。

⑤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彭曦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107—109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56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66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06页。

物化的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无非是人们互相间生产活动的关系。”^①相较于此前关于人的类本质对象化为货币的说法,这里的分析不仅更加精细,而且完全不再借助人本学的哲学设定。

其次,货币一旦成为交换价值的物性表现和中介,也就具有了调动一切财富的社会力量。马克思再次将货币比喻为“上帝”,但这一次已经不是在主客体关系的语境中,而是在商品经济总体的语境之中。货币作为“财富的一般物质代表”,成为能够涵盖一切财富实体的“财富总体”,于是“一跃而成为商品世界中的统治者和上帝。货币代表商品的天上的存在,而商品代表货币的人间的存在”,^②成为人们借以获取现实财富、调动社会资源甚至支配他人的力量,“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的或货币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③。货币的支配力量,不是出于人们逐利的主观意图,而是源于货币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客观功能。这种客观功能不是源于人们的类本质,倒不如反过来说,货币成为一切生产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共同尺度,冲破了人们传统的共同体生活,重塑了人类的“本质”,“货币同时直接是实在的共同本质(reale Gemeinwesen),因为它是一切人赖以生存的一般实体;同时又是一切人的共同产物”^④。从这里可以看到,马克思对其青年时代的人本学思路作了有意识的回应和纠正。

再次,货币的这种社会力量,对个人而言表现为一种磨灭个性的、异己的总体力量。马克思用“auslöschen”(消灭、磨灭)一词来描述货币对个人的影响。“不管活动采取怎样的个人表现形式,也不管活动的产品具有怎样的特性,活动和活动的产品都是交换价值,即一切个性,一切特性都已被否定和磨灭(ausgelöscht)的一种一般的东西。”^⑤在这一衡量体系中,“活动的社会性质,正如产品的社会形式和个人对生产的参与,在这里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物的东西”,货币与产品的交换“不是表现为个人的相互关系,而是表现为他们从属于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是不依赖于(unabhängig)个人而存在的,并且是由毫不相干的个人(gleichgültigen Individuen)的相互接触(Anstoß)而产生的”。^⑥这就是我们在前文分析过的经济关系总体对个人的主导作用。“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⑦货币异化正是在这种普遍交换的总体层面表现出来的。

最后,货币把人的个性问题转变为占有货币的问题,因此深刻影响了人们的主观追求。货币本来“同个人个性毫无联系”,归根结底,“占有货币不是占有者个性的某个本质方面的发展,倒不如说,这是占有没有个性的东西……它可以机械地被占有,也可以同样丧失掉”。^⑧在现代社会,人们靠货币购买的东西来装扮自己的个性。一旦丧失了货币,人们的个性特质甚至赖以生存的外在条件也会丧失。货币的这种巨大力量,“赋予个人对于社会,对于整个享乐和劳动等等世界的普遍支配权”。^⑨谁拥有货币,谁就拥有现实的社会支配权力。于是,对个性的追求就转变为对货币的追求;对社会权力的追求就转变为对成为“有钱人”的追求;对具体事物的欲望就转变为对抽象的价值量、对货币的欲望。^⑩可见,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1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73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78页。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II/1 (Berlin: Akademie, 2006), S. 150. 中译文根据德文有改动。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6—107页。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II/1, S. 90. 中译文根据德文有改动。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7页。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II/1, S. 90. 中译文根据德文有改动。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7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74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74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74页。

马克思关于拜金主义观念的剖析也已经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至此,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完成了对货币异化的系统重述,并且对他此前相关论述中涉及的几个主题都有所回应。总而言之,货币异化不是个别的人与物之间的颠倒支配关系,而是在现代商品经济体系中,人们的社会联系采取了货币这种中介物形式,进而表现为外在于所有个人的总体性支配力量。不仅如此,马克思明确地意识到,现代社会人们所面对的货币的本质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从流通手段变成了获取更多货币的“资本”。因此,对货币异化的批判,不能停留于货币自身,而必须进入对资本的全面考察。

四、资本批判视域中的货币异化:资本异化的物性化身

马克思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开始,确立了一条从“货币”到“资本”的经济学分析路径,并延续到《资本论》。他指出,货币是现代生产的基本目的,“作为一般财富的物质代表……货币必须直接是一般劳动的即一切个人劳动的对象、目的和产物。劳动必须直接生产交换价值,也就是说,必须直接生产货币”。^①请注意,马克思在这里不是要批判人们赚钱的主观目的,而是强调,在现代生产中,主导性的方面不是使用价值的满足,而是交换价值的创造与实现。人对使用价值的需要终究有限,但是,货币作为一般财富的代表,作为“万物的结晶”,它的量是趋于无限的。“作为起价值作用的价值而被固定下来的货币,是一种不断要超出自己的量的界限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过程。”^②可见,马克思批判的不是人对货币的主观欲望,而是货币自身的“欲望”,更准确地说,是货币自行增殖从而成为“资本”的客观机制。正是由于货币成为资本,货币异化的现象才如此显著。简言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货币异化的背后是资本异化。反过来,只有深入资本异化的种种表现,我们才能更加完整地理解货币异化。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前提,就是被货币关系掩盖起来的劳动与劳动条件的异化。资本主义的“整个生产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即雇佣劳动和资本使用雇佣劳动已经不是社会表面上的偶然现象,而是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关系了”。^③这种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前提是存在大量的劳动者,他们不掌握劳动资料,因此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没有“货币同劳动能力的交换”,“货币就不会成为资本,劳动就不会成为雇佣劳动”。^④劳动成为雇佣劳动,意味着劳动产品不归劳动者,并且反过来作为外在条件,迫使劳动者与货币占有者形成劳资关系。马克思说:“从资本的形式方面来看,这些对象条件必须作为异化的、独立的权力,作为把活劳动仅仅当作保存和增加自身的手段的价值(对象化劳动)而与劳动相对立。”^⑤这里强调的是,劳动同劳动条件的对立和异化,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而是这种生产的前提。这同时表明,马克思坚持认为,现代社会中劳动层面发生的异化,构成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结构的核心。^⑥

但是,由于货币的存在,人们很难看清这种对立和异化,因为“这种关系的全部内容,以及与劳动相异化的工人劳动条件的表现方式,都处于它们的纯粹的经济形式中,在这里,没有任何政治的、宗教的和其他的伪装。这是纯粹的货币关系”。^⑦这就是说,资本关系的生成离不开货币关系的伪装。“这种关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7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2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12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130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127页。

⑥普殊同:《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康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第185—186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149页。

系——在双方的意识中——被归结为单纯的买和卖的关系。”^①这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第一个环节,在这里,货币以商品交换的形式换取了劳动力,掩盖了劳动同其自身产物的异化。换言之,货币与劳动力的交换关系,已经潜藏着异化关系。

第二,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货币具有了支配工人劳动过程和生活过程的权力,这是货币履行资本职能之后发生的异化,也是资本主义异化的核心。马克思认为,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运动包含两个过程,先是货币购买劳动力的交换过程,再是前者支配后者的生产过程。随着劳动的力量在生产中变成资本的力量,“过去的对象化劳动就统治现在的活劳动。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颠倒了”。^②工人在劳动中创造的剩余产品表现为一种“独立化的交换价值”,它本来只是“对象化了的活劳动”,现在却表现为“异己的、外在的权力”,成为“消费和利用活劳动能力的权力”。^③这就是说,劳动过程成了价值增殖过程,成了资本家的赚钱过程,而资本赚得的货币表现为独立于劳动之外、进一步支配劳动的权力。马克思把这一过程称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并认为这是“比其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④

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工人的劳动已经通过工资得到了回报。但在马克思看来,货币作为工资,不是简单商品交换的物质结果,而是维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工具,是资本“取得未来(新)劳动的凭证”。^⑤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货币“是工人得到的一张领取市场上的一定量生活资料的凭证。因此,资本家潜在地掌握着生活资料,而这些生活资料则是他的权力的组成部分……实现劳动所需要的一切对象要素,都表现为同工人相异化的、处于资本方面的东西:劳动资料是如此,生活资料也是如此”。^⑥工人的劳动过程和生活过程都受制于“资本”,这正是工人在日常生活层面受制于“货币”的内因。换言之,现代社会中的拜金主义,根源于资本对人的总体性支配,根源于资本主导下的社会生产方式。

第三,在资本主义分配过程中,“生息资本”占据了重要地位,标志着货币异化在资本拜物教中达到了顶峰。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把收入归结为工资、利润、地租三者各自独立的形式,“以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生息资本又是“最完善的物神”。^⑦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上述收入形式遮掩起来了,劳动、资本、土地仿佛各自独立地创造出自己的收入。特别是在“G—G'”这一生息资本形式中,利息仿佛是货币自行创造出来的价值,“就像梨树的属性是结梨子一样”。^⑧能够自行生息的货币直接反映出资本自行增殖的本性,因此马克思说,“这个自动的物神,自行增殖的价值,创造货币的货币,达到了完善的程度,并且在这个形式上再也看不到它的起源的任何痕迹了。社会关系最终成为物(货币、商品)同它自身的关系”。^⑨可见,资本拜物教是社会关系幻化出的物性特征,而它最典型的表现形态,就是能够生息的货币。

马克思强调,生息资本不仅是观念层面的拜物教,而且是现实的“生产关系的最高度的颠倒”。^⑩这种颠倒在于,利息以及生息资本,明明源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却表现为一种脱离生产过程、从外部支配着生产劳动的力量。相比之下,产业资本家还和劳动者打交道,因此产业资本是在生产过程中与劳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15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12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42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50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36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153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2013,第302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11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04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12页。

动相异化；货币资本家则以独立于生产劳动之外的方式，与全部生产过程相“异化”。“利息自身正好表明，劳动条件作为资本而存在，同劳动处于社会对立中，并且转化为同劳动相对立并且支配着劳动的个人权力。利息概括了劳动条件对主体活动的关系上的异化性质。”^①耐人寻味的是，这种异化已经不再表现为对立，而是表现为对立的消失。“资本的异化性质，它同劳动的对立，被转移到剥削过程之外，即被转移到这种异化的现实行动之外，所以一切对立性质也就从这个过程本身排除了。”^②后来马克思提到，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形式是一种“异化的形式”，^③这种形式掩盖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表现为非对抗性的样子，这使庸俗经济学家更加喜欢这种理解，他们“正好是在价值的各个不同部分相互对立的异化中才感到十分自在”。^④简言之，资本最极端的异化形式恰恰表现为非对抗性的、“见物（钱）不见人”的收入分配形式。如果无法洞悉其背后的生产关系，也就无法理解这种分配背后特别是生息资本背后的异化。

时至今日，金融垄断资本在全世界日益盛行，马克思关于货币资本异化的分析更具启示意义。马克思的探索历程告诉我们，要透视货币的异化，既离不开主客体关系视角这一基点，更不能囿于人本学话语的桎梏。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必须进一步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关于货币异化批判的丰富思想资源，为深化关于货币异化的哲学研究打开理论空间。

（责任编辑：邓文斌）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53—35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5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63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62页。